

独立前的《蕉风》与马来亚之国族想像

The Pre-independence *Chao Foon Fortnightly* and its Envisioning of a Malayan Nation

© 2012 林春美 Lim Choon Bee *

[摘要]

《蕉风》是创刊于1955年的马华文学杂志，逾半个世纪的出版成果，使它成为马华文学的重要资产。从其创刊初期的编辑理念及所刊用的作品看来，它对后殖民马来亚之新兴国族充满了憧憬与想像。本文即在探讨这本由移民文人所办的文学杂志，在马来亚建国前，如何参与马来亚国族建构之论述，并指出其所意图之马来亚国族面貌。

[关键词] 《蕉风》，马华文学，马来亚国族

—

创刊于殖民地时代的文学杂志《蕉风》，是马华现代文学的重要资产。它1955年由文化机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所创办，至今已出版超过半个世纪，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中文文学刊物之一。¹

友联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于香港。虽然其内部同仁对其“背景”讳莫如深，然而许多学者相信，它是冷战年代“美元政策”的产物，曾经接受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等美国机关的资助，通过文化工作以进行反共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与团结民主力量，影响中国大陆政局，促使中共政权结束。²友联曾先后在香港办过多种不同性质、以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群为对象的刊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以及《儿童乐园》。

1950年代中期，友联的事业由香港扩展至南洋。³他们在东南亚诸邦之中选择了与香港同属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与马来亚，作为拓展其文化事业的基地。⁴《蕉风》虽为这批香港南来文人所创办，然而，作为以马华社会为对象，并实际上在此编辑、出版与发行的刊物，马来亚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状况，以及该刊所必须借助的本地编者、评论者与作者等等因素，必然都影响着这本刊物的基本面貌，致使它不可能只是友联在香港的刊物

*林春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研究。电邮地址：
lcbee@fbmk.upm.edu.my

¹现在仍然发刊的《蕉风》，1999年曾一度休刊。它2002年复刊至今，由民办教育机构南方学院承担出版事务；在那之前，则一直是友联机构的属下刊物。

²有关友联的背景，可参考金千里，“50-70年代香港的文化重镇——忆‘友联研究所’”，《文学研究》，第7期（2007）：第168-176页；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素叶文学》，第61期（1996）：第30-33页；也斯，“解读一个神话？——试谈中国学生周报”，《读书人》，第26期（1997），第64-71页。

³友联创办人之一徐东滨将友联的工作性质定位为文化工作，而非政治工作。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友联移师新马的目的，乃在发展文化工作。详岳心（徐东滨），“回忆学生报的诞生”，《中国学生周报》，第470期（1961），第2页。亦可参考林起，“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一面旗帜——徐东滨”，《文学评论》，第2期（2009），第154-172页。

⁴根据其后来长期成为《蕉风》主要负责人的姚拓的说法，那是基于英殖民政府给予他们单凭一张准证，即可随意出入与定居之便利的缘故。详氏著《三十四件行李》，《雪泥鸿爪》（吉隆坡：红蜻蜓，2005），第561-564页。

的“星马版”而已。⁵从其实践效果而言,在马来亚迈向独立、在地华裔社群面对国族认同抉择的关键时刻,《蕉风》的风格及此刊所发表的诸多作品,在某个程度上可说体现了当时相当层面的华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本文即从《蕉风》的编辑主张与舆论、编辑理念之实践,及创作文本此三方面,探讨其编者们的,对即将诞生的新兴马来亚国族的集体召唤与想像。必须指出的是,此处所言“马来亚”,乃是包含新加坡在内的广义的指称。这一方面固然是早期华人的习惯叫法(一如早年新、马两地文学俱称为“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之出现,是新、马分家以后的事),亦在极大程度上反映当时华社反对新、马分家的立场;⁶另一方面,证之早期的《蕉风》本身,我们亦可发现,要将新、马截然分割,其实也是十分困难的:其一,立意要扮演“纯马来亚化”文艺刊物的《蕉风》,⁷其出版社与编辑部乃设立在新加坡,而非日后我们狭义定义下的马来亚。这种情况从这本刊物创刊起,一直维持到1959年出版社随友联印刷厂迁移到吉隆坡为止。⁸其二,参与实践此刊物之“纯马来亚化”理念的多位编委,当时主要就在新加坡生活,其中多位后来更成了新加坡公民(详后)。其三,在他们的思想、及其所落实的言说与编辑方式中,新马虽为二地,实乃一家。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总合二地华人人口而得出“马来亚有三百万华人”的说法,⁹及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将〈新加坡掌故谈〉一类的文章,归纳入“马来亚风土介绍”的类别之下。¹⁰由于《蕉风》在马来亚独立、以致新马分家后渐次呈现不同的编辑面貌,故本文仅将范围锁定在独立之前的情况。

二

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先后推出两个影响日后马来亚国族建构深远的计划/改制,即:1946年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与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前者宽松的公民权条件,不意激发了马来社会强烈的族群国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精神;后者的实施则意味着英国人被迫认可此地为“马来邦国”(Malay State),并承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¹¹出于对前者的反弹,40年代末期的马来文学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殖斗争精神;而进入50年代,这种强烈的情感更进一步表现为对独立

⁵友联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曾有星马版,直至1956年该机构在新加坡注册出版《学生周报》后,此版方才取消。

⁶战后,殖民地政府成立“宪制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底拟就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建议书。此建议书公布后,引起新加坡、马六甲、雪兰莪、檳城、吡叻等地的华人社团的激烈反对。认为新加坡不应与马来亚联合邦分离,即是他们呈交予政府的备忘录的要点之一。详阅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之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五章。

⁷在其创刊词中,《蕉风》编辑部即已明确交代这个意愿。见〈蕉风吹遍绿洲——创刊词〉,《蕉风》第1期(1955),第2页。它在数十期的封面上亦打出“纯马来亚化文艺半月刊”的旗号,本文第三节将进一步讨论此点。

⁸根据《蕉风》元老姚拓与白垚的回忆录,《蕉风》是在1958年从新加坡迁往吉隆坡的。详姚拓“马华文学上的长春树——蕉风”,《雪泥鸿爪》,第570页;及白垚“何物千年怒若潮”,《缕云起于绿草》(八打灵再也:大梦书房,2007),第73页。然而,若根据当年《蕉风》的版权页,至1958年12月号(第74期)为止,《蕉风》出版社的地址还是在新加坡,直至1959年4月号(第78期),出版社地址方改在吉隆坡。这里可能的情况是:一、友联旗下的马来亚出版印务公司已于1958年迁至吉隆坡,而《蕉风》在联合邦的注册与出版准证却在次年方才获准,因此尽管主要负责人已迁往吉隆坡办事,然而版权页上出版社地址的更换却得在1959年4月方能落实;二、上述回忆录写于事发的四、五十年后,实际年份与记忆所及有些微出入,亦不足为奇。本文以版权页上蕉风出版社地址的正式迁马为准。

⁹此语出自马摩西〈沙漠的边缘〉,《蕉风》,第1期(1955):第4页。其实1950年代中期马来半岛华人人口仅有二百三十余万,此数必须加上新加坡一百万左右的华人口,方能够上该文所言之数。新、马两地当时人口统计资料,详钟临杰〈西马华人人人口变迁〉,见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第203页;及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社,1994),第226页。

¹⁰对该文的归类,可见《蕉风》合订本,第一卷总索引。此处所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¹¹详 Cheah Boon Kheng, “Envisioning the Nation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in *Rethinking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Malaysia, Sri Lanka & Fiji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Abdul Rahman Embong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7), pp. 40-56.

的呼唤、与对马来民族主权的呼吁。¹²这正是1955年《蕉风》创刊时的社会语境。

《蕉风》虽由友联出版，然其编辑事务却由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编委会成员除了创办人申青、执行编辑方天之外，其他人皆非友联成员。他们包括马摩西、陈振亚、范经和李汝琳。在受邀成为编委时，他们已在殖民地马来亚的文化界或教育界活动将近十年之久，多少经历过由马来亚联邦与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所掀起的马来民族主义热潮。¹³他们以其实在马来亚生活的切身经验，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新来乍到的友联诸人本土认知之匮乏。刊物之名经编委讨论之后，定为“蕉风”，而非早期所拟的“拓垦”。“拓垦”颇有友联诸人到华侨社会“发展文化工作”之寓意；而出自形容热带地方色彩的成语“蕉风椰雨”的“蕉风”，则更能突显其“地方性的风格”。¹⁴友联集团欲使东南亚华人社会与共产中国保持距离的理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这本刊物纯马来亚化概念之提出；然而，舍“拓垦”而取“蕉风”，也不无过滤掉此刊物背景原有之政治意图的作用，使它从根本定位上朝向“本土化”发展。

从早期《蕉风》所刊舆论可知，其编作者所关注的，是脱离殖民统治之后的马来亚在其国族与文化建设上，是否能实践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问题。友联的反共背景，使之首先主张抑制左翼势力成为“新殖民地统治潜势力”之可能¹⁵。在创刊之初，本地一资深新闻工作者李亨应《蕉风》编者特邀而写的三篇文章，已可作为友联之同路人在这刊物上发出的先声。¹⁶李亨在第一篇文章中，明确非议“失却独立性与自尊心”的“附庸文学”。¹⁷其后，李亨在第二篇文章中直接表明，“反殖民地主义”，正是此时此地文学之所需。¹⁸将此二文与李亨的另一篇文章一起阅读，即可明白李亨之“殖民地主义”，其实与附庸心态、缺乏独立性、甚至封建思想，是互为表里的。¹⁹李亨之文，很难让人不联想起二战前后本地文坛关于“马华文艺是否中国文艺之附庸”的论争。其主张不附庸于其他文艺/政治势力之说，可为《蕉风》国族构思的基调。这种想法，在《蕉风》于马来亚独立前夕特约蒋保撰写的文章中，得到更进一步的申明：

马来亚的独立，不只是政治上的解放，也应是文化上的解放，使马来亚的文艺更具有独立的性格。它不但不受政治压力的钳制，不受思想教条的束缚，不作政治的附庸；并且逐渐摆脱外地文化的影响，形成马来亚的独立文艺。²⁰

《蕉风》编作者们对政治解放不一定等同于思想文化解放的洞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其时已经清楚意识到，国族，并不必然伴随主权国家的形成而诞生。他们一方面防范即将成为新兴国族之一员的本邦华族成为中国政治之附庸，另一方面也反对他们成为马来族群之从属。当时马来亚境内的主流论述，是以马来亚为马来人属地，因此主张赋予马来人对新生国族的支配权。《蕉风》编作者不认同这种论述，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并不认为马来人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是马来亚的大地之子，而是与华人一样，都是外来的。

1956年，当宪制谈判在伦敦积极展开之际，《蕉风》刊登了几篇文章，明确表明

¹² 详Kamaruzzaman Abd. Kadir. *Nasionalisme dalam Puisi Melayu Modern 1933-1957*.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2).

¹³ 马摩西于二战结束后奉派来新马领事馆做事，在大陆易权后投入教育界服务。陈振亚1946南来，范经与李汝琳则是1947抵新。这几名编委之中，除了方天几年后离马，其他诸人皆在本地落地生根：马摩西入籍马来亚，申青、陈振亚、李汝琳、范经则入籍新加坡。关于他们的更多介绍，见马仑《新马华人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

¹⁴ 申青在《蕉风》创刊42年后的一篇回忆文字上，首次提到刊物原拟取名“拓垦”之事。详“忆本刊首届编委”，《蕉风》，第483期（1998），第84-86页。

¹⁵ 沙里明在《蕉风》所办的文艺座谈会上之发言。见“1957年马华文坛的展望——文艺座谈会之五”，《蕉风》，第29期（1957），第5页。

¹⁶ 根据编者的介绍，李亨曾主持过几间报馆的编务，其文笔以犀利见称。详“编者·作者·读者”，《蕉风》，第2期（1955），封底内页。

¹⁷ 李亨，“此时此地的文学”，《蕉风》，第2期（1955），第3页。

¹⁸ 李亨，“文学的现实性”，《蕉风》，第4期（1955），第2-3页。

¹⁹ 李亨，“封建主义的文学”，《蕉风》，第5期（1956），第2-3页。

²⁰ 蒋保，“马华文艺的时代性与独立性——写在马来亚独立的前夕”，《蕉风》，第44期（1957），第5页。

“马来亚化不等于马来化”的看法, 并质疑此地既叫“马来亚”, 即为“马来”人的国家的逻辑。作者慧剑即提出, 不能因为此地叫马来亚, 就认为它“自然是马来人的国家”。他从到中国经商的阿剌伯人的游记中提及的“Malaya”, 以及中国古代到天竺求法的高僧的记载中所谓的“摩赖耶”一地, 推测现今“马来亚”之名, 其实是脱胎自印度东部一个叫Malaya的地方。言下之意, 即“马来亚”并非得名自“马来”民族, 因此后者不应该将马来亚视为他们之专有, 继而垄断对马来亚政治乃至文化等各层面的决定权。他认为, 以“马来化”与“马来亚化”混同, 只是马来政客利用一般人对马来亚的无知与错觉, 企图将独立后的国家变成“纯马来化的马来联合王国”的手段而已。他更指出, 马来亚其实亦只是马来人的“第二家乡”, 他们其实在十二世纪时方才从苏门答腊的巨港和占卑移民至此。²¹另一作者海燕在回应慧剑之文时亦认为, 若论移殖之先后, 则华人并不晚于马来人。²²而根据《蕉风》编者, 华族“曾开发这土地三四百年”。²³对于华人移民马来半岛的时间及其历史, 《蕉风》编者与作者显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说法。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马来亚的华人移民史并非如马来亚的主流社会一般所认定, 始自英国人输入大量外劳以开发马来亚天然资源的十九世纪末期, 而是更早之前; 而且华人对本地的物质建设有着一定的贡献, 与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所刻画的本土财富的掠夺者、殖民剥削政策的同谋者的形象, 因而有极大的差别。既然华人居住此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因此在国家即将独立之际, 华人对于国家的认同, 应该作出更明确的选择。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 从战后至建国之间的十余年, 新马华人社群在政治认同上产生巨大变化。许多人都已意识到转变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并开始积极关注本地事务的发展。²⁴姑且不论土生土长者, 即使是在战后方才南来的部分华人, 在经历马来亚联合邦宪制之实施与其后的政治发展之后, 对本地政治亦不无觉醒。《蕉风》编委兼活跃的作者之一马摩西, 就极不认同马来亚华人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他指出, “若果我们只把马来亚当做赚钱的地方”, 其结果是“只有步前人的后尘让政治的压力所支配”。²⁵华人对马来亚联邦计划反应迟钝与冷淡、以致最终自食其恶果的历史, 显然促使马摩西作出深刻反省。因此他主张华人将马来亚“当做永久居住的家乡”, 积极参与建设, 以“建立名符其实的独立的马来亚。”²⁶另外一名编委陈振亚, 也非常反对华人的侨民心态, 提出应该转变诸如“流落/落籍/流亡番邦”的心理。²⁷而《蕉风》编者更早就在交流栏目里呼吁华人放弃其“客居”的心态, 而负起“主人的责任”。²⁸换言之, 即在共同建设本土文化的过程中, 华人与其他宣称自己拥有主权、或被认为是真正的土著的“马来亚各民族”之间, 是“精诚的合作”的关系²⁹, 而非主从的关系。从许多文章可知, 《蕉风》的编委与主要评论者们在文化思想或用语之习惯上, 还不能完全割舍“中国人”的身份; 尽管如此, 在国族面貌之抉择上, 他们明确主张融入在地的社群与文化, 而摒弃离散、流放的心态。

三

Anthony Smith在其《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指出, 国家(state)与国族(n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与制度行为相关, 而后者则指“被感觉到的

²¹慧剑, “马来亚化是什么”, 《蕉风》, 第16期(1956), 第6-7页。

²²海燕, “马来亚化与马来化”, 《蕉风》, 第18期(1956), 第4-5页。

²³“编者·作者·读者”, 《蕉风》, 第6期(1956), 封底内页。

²⁴详阅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黄贤强《跨域史学: 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²⁵马摩西, “马来亚化问题”, 《蕉风》, 第18期(1956), 第2页。

²⁶同上。

²⁷这是陈振亚在《蕉风》主办的第一次座谈会上的谈话。见“漫谈马华文艺——文艺座谈会之一”, 《蕉风》, 第20期(1956), 第4页。

²⁸“编者·作者·读者”, 《蕉风》, 第6期(1956), 封底内页。

²⁹同上。

和活着的共同体，其成员共享祖国与文化”。³⁰在作为国家的马来亚正式诞生之前，文学杂志《蕉风》已通过其编辑理念之实践，让我们得以窥见其对马来亚国族“共同体”的想像。

作为一本中文文学刊物，《蕉风》显然拨出了颇多的篇幅来刊登一些或非中文原著、或非创作性质的文章。以其创刊首半年所刊文章为例，其中不属中文文学的篇目大致可以罗列并分类如下：

分类	题目	刊期
与马来亚相关的民间传说与轶事	蛇的传说	1
	孕妇岛	2
	马来勇士汉都亚的童年	3、4
	勇士汉都亚的成名	5、6
	汉都亚扬名爪哇	8、10
	汉都亚成仙	23
马来亚历史、传说、见闻的翻译	捕虎记	1
	百年前的星洲天地会	3、4、5
	马来人的魔术	3
	鬼猎人	4
	巴豆的故事	6
	富有历史性的怪石	8
	百年前来自中国的帆船	10
	捕象记	16
	虎在新加坡	16
	蟋蟀老人	17
	百年前的星洲奴隶市场	20
	马来亚社会纪实	母土的呼喊—记巫统妇女部游艺会
光荣的马来家庭		20
马来亚风土介绍	新加坡掌故谈	1、2、3
	马来人的婚俗	6
	椰花酒	8
	马来甘榜	9
	印度人的婚礼	10
	马来人捕鱸鱼	11
	马来人与弄迎	12
	沙盖	13

³⁰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页。本文所用译本中，nation一词，原作“民族”，此处考量所用术语之一致性，故用“国族”。本文选择使用国族一词，乃为凸显马来西亚境内各个不同“族”群，出于各种原因——或被迫、或自愿、或别无选择，却因应一个新生的“国”家单位/疆界之建构，而结合成一“共同体”的关系。

	马来人的风俗	14
	马来亚的服装	15
	马来人为什么忌食猪肉呢	15
	榴莲季节话榴莲	17
	我所知道的印度人	17
	马来人的生活	18
马来亚历史小说翻译	马六甲公主	6-21
马来文学译介	谈马来诗歌班敦撰	3
	马来民歌选译	17
	马来班顿	25

以上列表显示, 以马来亚为背景的各类非文艺书写, 以及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翻译, 几乎每一期都出现。在其创刊词中, 《蕉风》曾表示不能苟同以“文化沙漠”来揶揄马来亚的作法, 可是也冀望创办一份“纯马来亚化的文艺刊物”, 以让此地“滋长出茁壮的文化嫩苗”。³¹“纯马来亚化文艺”也是《蕉风》的自我定位, 这标语自创刊号起连续多期显著地出现在封面上。而其稿约的第一条, 就是“凡以马来亚为背景之文艺创作……皆所欢迎”。以上列表中的篇目, 以及不包括在其中的为数可观的马来亚各地的地方书写与游记, 及较后的马来亚生活素描之类的文章等, 似乎都可说明早期《蕉风》在强调与落实其“马来亚化”方面, 比展现其“文艺性”方面更显积极与热切。这些文章内容所涉, 从历史传说, 到民俗风土以及社会文化, 包容甚广。大量刊用的目的, 在创刊词中已有所揭示: “这也许就是我们了解环境达到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最好办法。”³²而由以上篇目广泛涉及马来亚另外两大族群与原住民的内容看来, 《蕉风》的“纯”马来亚化文艺之大纛, 其实是建立在对马来亚社会族群与文化多方面的“多元”性质的认知, 及对其的渴求理解之上。在她的理性构想中, 马来亚国族并非由单一族群构成; 而其成员之文化, 亦不该由单一族群文化垄断。这个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共同体既然即将共享同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其成员所共有之文化, 借《蕉风》所刊的舆论来说, 也必须是“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一个新文化”³³“乃是能够真正代表马来亚华、巫、印三大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利益的文化”³⁴。

四

在独立前《蕉风》所刊的文学创作中, 对国族问题的思考, 主要表现在本身的族群身份可不可能被主流(马来)社会认可与接受的书写上。其中, 以华巫之间的爱情为主线的小说,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华巫之间族群关系之寓言。琼山〈蕨河之水慢慢流〉中一对异族恋人之间的对话, 颇能表达这种情况:

“别人常说: 赤道上的青年男女很热情, 你认为这话说得对吗? 还有, 你对马来亚留恋不? 对我们马来人的观感又怎样?”

“唔, 我也这么说。”她对第一点表示了同意, 接着又说: “我从小就生长在马来亚, 我觉得马来亚是一个乐园, 这都是我们祖先的一滴血一滴汗播种出来的。”

“为什么你们‘支那’有繁荣的祖国不回去, 却要在这遍处蛮瘴的地方居住呢?” 马汉的神气十分的怀疑。

“我们在这里投下了血汗, 就爱恋着这块地方。我们中国人和你们马来民族

³¹ “蕉风吹遍绿洲——创刊词”, 第9页。

³² 同上。

³³ 慧剑, “马来亚化是什么?”, 第6页。

³⁴ 海燕, “马来亚化与马来化”, 第4页。

都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大家合作起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独立国家，你说可能吗？”³⁵

以上对白虽嫌显露与生硬，然而却明确表现了马来社会的基本疑虑，及华人因其移民（或移民后裔）身份而被质疑其对马来亚之忠诚的问题。在山芭仔〈太平湖之恋〉中，华人男主角同样被其异族恋人的父亲怀疑只是将马来亚当作淘金之地，而迟早都要离弃此地回中国去的。虽然两篇小说的华人主角都坚决表示对这片祖先曾经撒过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然而族群整体的情绪到底比个人情爱更具支配力。前一篇中的女主角，最终因为两族之间的历史仇恨（其母在日治时期为马来浪人杀害），不被允许与爱人结合，而致殉情；后一篇中的一对恋人虽然誓不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妥协，然而在这“黑暗的儿子”未能彻底被击败之前，他们还是被逼分离。³⁶

与此同类的作品，还有罗纪良的〈阿末与阿兰〉和卿华的〈乌水港〉。〈阿末与阿兰〉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青梅竹马，然而华巫二族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识却始终是他们爱情的障碍，小人的挑拨轻易地就导致他们长久的生离，多年无法冲破的种族藩篱最后更造成他们的死别。³⁷〈乌水港〉中的华人男主角虽然为村民所称赞，然而其恋人的父亲终究因为华巫文化之异而反对女儿与他在一起；不合礼法的私奔，于是成了这对恋人长相厮守的唯一出路。³⁸

此外，辛生（方天）所著〈一个大问题〉，讲述的则是当时困扰许多华裔的公民权问题。小说通过华裔老者阿兴与两个马来顾客的对话，提出非巫裔申请公民权方面所面对的诸多阻碍。首先是面对强势的马来族群政党巫统对华人出生地公民权的反对，因此阿兴的儿子，即使是生在马来亚，也无法取得公民权。而阿兴本人，前后在此地居住了近二十年，理应符合公民权的申请条件，然而日治时期他由于生活困难而暂避居新加坡几年，致使在半岛的累积居住年数出现中断，因此也丧失申请的资格。然而，阿兴的另一同业，即使寸步不离在此居住三十多年，但因为不通晓官方语言，也同样没办法登记公民权。小说借此三类案例，对公民权授予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并对华人仅有居留便利、而不能法行使公民权利的不合理处境作出抗议。作者亦借华巫人物的对话，有意无意讽刺了主流社群在种族主义心理作祟下，一方面不排斥安分守己的华人为公民，另一方面却对其应否获得公民权不置可否的态度。³⁹

唤云诗作〈近打河的潮声〉，亦是对公民权利的呼唤：“近打河底潮声，/呼喊着独立的口号；/猛得革！/猛得革！/每颗人们跳动的心，/热血在沸腾。//响亮的潮声呀！/激起遍野回音：/公民权！/公民权！/人们呀！声已嘶哑！/怒火爆出心坎！/巫文！/英语！/恶魔似的狂风，/嗤嗤地冷笑，/黄叶纷飘落河床。”⁴⁰。此诗以18、19世纪华人移民主要聚落之一的锡矿区近打河为场景，并让“猛得革”（merdeka，独立之意）与“公民权”的激越呼声响彻其上，一方面既寓意华人对结束殖民统治的殷切盼望，另一方面亦透露华人渴望为新生国家所认同的强烈意愿。诗中“巫文”与“英语”所发出的恶魔似的冷笑，亦暗示在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不平等的政策下，华人对自身在此地的政治前景之担忧。

而在堪忧的大环境中，各族能够接纳彼此族群身份与文化之差异，融合共存，一般被认为是建构国族的最佳途径。叶绿素即在新诗〈日子〉中，对三大民族“兄弟”联合力量，足以踩倒“狭窄民族的墙”寄托希望；⁴¹而寒行〈三个人〉，则冀望“马来亚三

³⁵琼山，“蕪河之水慢慢流”，《蕉风》，第14期（1956），第20页。

³⁶山芭仔，“太平湖之恋”，《蕉风》，第21期（1956），第9-11页。

³⁷罗纪良，“阿末与阿兰”，《蕉风》，第36期（1957），第7-16页。

³⁸卿华，“乌水港”，《蕉风》，第43期（1957），第6-9页。

³⁹辛生，“一个大问题”，《蕉风》，第12期（1956），第3-7页。

⁴⁰唤云，“近打河的潮声”，《蕉风》，第25期（1956），第17页。

⁴¹叶绿素，“日子”，《蕉风》，第12期（1956），第2页。

大民族团结，/共同来增进马来亚的繁荣！”⁴²

从国族想像的角度观之，上述这些作品可说皆表现了毫无异议的对马来亚多元族群社会的认同，然而却也无可掩饰地透露了作者集体对本身族群不为即将诞生的共同体所接纳的焦虑。在颇大程度上，此类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族群关系的感受与看法。实际的社会状况无法让他们对族群之间的关系盲目的表示满意，然而他们对跨越族群藩篱，建立多元而和谐的社会却充满憧憬。几乎在所有的以爱情寓言的故事里，生离或者死别都不代表爱情的失败。在一些故事中，异族男女在分手之际还能互相祝愿友谊永固，并对两族携手共谋未来的幸福表示极大的企望。而在另一些故事中，至死不渝的爱情更说明真爱足以战胜一切分歧，个人的牺牲甚至被赋予摧毁偏狭民族意识藩篱的力量，足以促成两族的和解。这种对多元族群和睦共处、继而共同建构新兴国族的想望，在“猛得革”的憧憬中，尤显得热切。

五

马来亚（及较后的马来西亚）之国族建构，在新、马合而又分，联合邦获得独立逾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是一项未竟的政治议程。1991年第四任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在其“2020年宏愿”下所展望的“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激发民间各种不同的反应与诠释，至2008年第六任首相纳吉（Najib Tun Razak）“一个马来西亚”（Satu Malaysia）口号引发朝野各政党对于“马来西亚人优先”还是“马来人优先”的争议，都足以说明这一点。⁴³

相对于政治话语的模棱两可，文学杂志《蕉风》则早在建国前夕即已通过“纯马来亚化”编辑理念的倡导与实践，为马来亚国族勾勒了轮廓鲜明的素描。其编作者们对真正贯彻“独立”意义的马来亚的追求、对马来亚社会多之元性质的洞察与认可，及对融合族群与文化差异之根本肯定，构成了其所意图之国族（nation-of-intent）的精神面貌。总括而言，这个面貌或许可以1956年《蕉风》作者的一句话归结之，曰：

各民族在马来亚，无论是主要的民族抑或是少数的民族，其地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各民族对外应合称为一个马来亚民族。⁴⁴



⁴²寒行，“三个人”，《蕉风》，第31期（1957），第21页。

⁴³有关此点，可参考 Cheah Boon Kheng, “Envisioning the Nation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与 Shamsul, A.B., “Reconnecting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in *Rethinking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Malaysia, Sri Lanka & Fiji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40-56, 204-215.

⁴⁴海燕，“马来亚化与马来化”，第4页。